



海外华文文学史

[第一卷]

陈贤茂 主编



海外华文文学史

[第一卷]



鹭江出版社
Luhong Publishing House

[闽]新登字 08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外华文文学史/陈贤茂主编. —厦门: 鹭江出版社,
1999. 8

ISBN 7-80610-681-2

I. 海… II. 陈… III. 中文-文学史-国外 IV. I1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37579 号

海外华文文学史

(第一卷)

陈贤茂 主编

*

鹭江出版社出版、发行

(厦门市湖明路 22 号 邮编:361004)

福建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三明市新市中路 70 号 邮编:365001)

开本 850×1168 1/32 23.875 印张 4 插页 575 千字

1999 年 8 月第 1 版

199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200

ISBN 7-80610-681-2/I·117

(精)全套定价:139.70 元 本册定价:38.70 元

(平)全套定价:111.70 元 本册定价:31.70 元

如有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主编：陈贤茂
副主编：吴奕锜 陈剑晖

第一卷 撰稿人

陈贤茂：第一章，第二章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第十一节，第三章第四节（尤今）、第五节，第四章第一节、第二节、第四节（王润华）

吴奕锜：第三章第一节、第二节、第七节（骆明），第四章第八节（彼岸）

陈剑晖：第二章第四节、第六节、第九节（刘思）、第十节，第三章第三节、第九节、第十节（张挥、美华），第四章第五节（周粲）、第六节、第九节（陈剑）、第十六节

赵顺宏：第二章第五节，第三章第七节（风沙雁）、第八节、第十二节，第四章第八节（史英）

刘俊峰：第二章第七节，第三章第六节（梅筠）、第十节（林高）

彭志恒：第二章第八节、第九节（范北龄），第三章第六节（石君、安琪）、第十一节

周可：第三章第四节（尤琴）、第七节（周颖南），第四章第三节、第四节（谈莹）、第五节（李庭辉）、第七节、第十节、第十一节、第十二节、第十三节、第十四节、第十五节

翁奕波：第三章第十三节，第四章第九节（方然、梁文福）、第十七节

目 录

第一卷

第一章 海外华文文学导论	(1)
第一节 海外华文文学的定义、特点及发展前景	(1)
第二节 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关系	(18)
第三节 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化	(30)
第二章 1965年以前的新马华文文学	(50)
第一节 新马华文文学发展概况	(50)
第二节 方北方的小说	(64)
第三节 姚紫的小说	(82)
第四节 苗秀的小说	(96)
第五节 李汝琳、李过	(110)
第六节 韦晕、魏萌	(120)
第七节 姚拓、君绍	(136)
第八节 韩萌、米军、萧村	(159)
第九节 刘思、范北羚	(178)
第十节 文学史家方修	(189)
第十一节 新马散文掠影	(198)
第三章 新加坡华文文学(上)	(212)

第一节	新加坡主要文学社团	(212)
第二节	黄孟文、陈华淑	(221)
第三节	田流、流军	(241)
第四节	尤今、尤琴	(260)
第五节	蓉子、孟紫	(281)
第六节	梅筠、石君、安琪	(300)
第七节	骆明、周颖南、风沙雁	(314)
第八节	郑子瑜、英培安、林康	(334)
第九节	黄叔麟、林琼、淳于汾	(353)
第十节	张挥、美华、林高	(370)
第十一节	谢裕民、吴韦材、曹兮	(398)
第十二节	杨松年、周维介、林万菁	(416)
第十三节	其他散文、小说作家	(431)

第四章 新加坡华文文学（下）

第一节	新加坡华文诗坛的历史回顾	(446)
第二节	五月诗社的艺术追求	(464)
第三节	陈瑞献	(480)
第四节	王润华、淡莹	(494)
第五节	周粲、李庭辉	(515)
第六节	原甸、严思	(539)
第七节	适民、槐华、杜红	(556)
第八节	史英、彼岸	(582)
第九节	陈剑、方然、梁文福	(595)
第十节	杜南发、潘正镛	(616)
第十一节	贺兰宁、郭永秀	(633)
第十二节	文恺、南子	(654)
第十三节	谢清、林也	(674)

目录 · 3 ·

第十四节	梁钺、董农政	(693)
第十五节	简笛、希尼尔、伍木	(711)
第十六节	长谣、喀秋莎、古琴	(737)
第十七节	其他诗人	(749)

第一章 海外华文文学导论

第一节 海外华文文学的定义、 特点及发展前景

中国人移居海外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秦汉时代。《史记》记载，秦始皇曾派方士徐福率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延年益寿药。据说徐福等人后来到了日本，就在日本住下来了。如果传说属实，那么，徐福率领的数千童男女，就是第一批移居海外的华人了。从汉末到魏晋南北朝，也有部分中国人为避战乱而移居朝鲜、日本。在日本的一些古代史书中，就有关于汉族“归化人”的记载。由于年代久远，这些人早已由归化而同化了。

到了唐代，中国与外国的交通，无论陆路或水路，都非常发达。中外通商贸易，也十分繁盛。随着对外贸易的发达，中国人旅居海外的逐渐增多。为避战乱而移居海外的，数量也不少。从唐代以至于近代，旅居海外的华人通常被称为唐人，华人聚居区称为唐人街，这固然是由于唐朝国力强盛的缘故，但另一方面，也说明唐代移居海外的中国人增多，因而使唐人成了海外华人的通称。

在明代以前，中国人居留海外（无论长期或短期），还是少量

的。明清以后，尤其是鸦片战争以后，才开始了中国人大规模移居海外的历史。考其原因，一是闽粤沿海地区地少人多，加上水旱频仍，天灾人祸，大批破产农民不得不离乡背井，出国谋生。这是最主要的原因。二是由于战乱或改朝换代等政治上的原因，迫使许多中国人移居海外。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开发美洲以及掠夺东南亚殖民地的资源，迫切需要大批劳工，于是更促成了中国人的移民浪潮。据统计，截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止，移居海外的中国人约为 1000 万人，到今天，估计总数已达 5000 万人。

明清以前移居海外的中国人，由于人数少，大多已被当地居民同化。明清以后，由于移民众多，而且多是聚族而居，形成独特的华人社会，因而即使数代以后，也仍然保留着华人的传统文化、风俗习惯、语言文字以及共同的心理素质，不易被当地居民所同化。如果对海外华人社会加以深入考察的话，可以发现，血缘关系固然是保持民族感情的基础，而广泛存在于华人社会的华文教育、华文报刊、华文文学等，更是维系华人民族特性、民族意识的重要纽带。因此，移居海外的华人先辈，很早就十分重视华文文化教育事业。

海外华文教育究竟始于何时，现已无从查考。据《中华民族拓殖南洋史》^①一书记载，早在清雍正七年（公元 1729 年），荷属东印度群岛的巴达维亚城（今雅加达），已有明诚书院之创设。又据《新马华人教育发展小史》一文所述：“1786 年以前，英人莱特（F. Light）初到马来亚的槟城，就发现有华人老师张理之的坟墓。英传教士汤姆逊（G. H. Tomson）也说，新加坡在 1829 年已有私塾三所。但是有文献可考的，当首推陈金声父子所办的萃英义

^① 刘继宣、束世激合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8 年。

学，又称萃英书院。它创立于 1854 年，直到 1957 年才停止。”^①当时南洋各地的书院，多附设于大伯公庙内，设备十分简陋，所用课本，则不外《三字经》、《百家姓》、《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之类，与国内的私塾相似。戊戌政变之后，国内废私塾设学校，南洋各地也开始有新式学校出现。1899 年，清政府派驻菲律宾第一任领事陈纲之父陈谦善，在领事署中设立华侨学校。4 年后，学校移于善举公所，加授英文，定名为小吕宋华侨中西学校，可算是南洋华侨开设的第一所新式学校。^②1900 年，巴达维亚城也创办了中华学堂，此后一二年内，荷属东印度群岛各地陆续成立新式学校 20 余所。^③新马的新式学校的创立则稍迟一些。1904 年，槟城创办了中华学堂。自此之后，东南亚各地均陆续创办了新式学校，取代旧式的私塾。根据中英侨务委员会的调查，1929 年，新马两地共有华校 108 所^④，可见当时海外华文教育的发达程度。华文教育不仅培育了海外华人的民族意识，而且也为华文报业和华文文学创作活动提供了可靠的基础。

海外第一份华文报纸，是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创办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1815 年 8 月 5 日在马六甲印行，主编是米旃，助理编辑是华人梁发。^⑤1856 年 12 月，美国华人司徒源创办《沙架免度新录》（沙架免度为加州首府 Sacramento 的广东话音译，现通译

^① 方起驹、杨耀宗、金永礼：《新马华人教育发展小史》，见《华侨史研究论集》，第 331 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 年。

^{②③} 刘继宣、束世激：《中华民族拓殖南洋史》，第 186 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68 年。

^④ 方起驹、杨耀宗、金永礼：《新马华人教育发展小史》，见《华侨史研究论集》，第 33 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 年。

^⑤ 马岱：《新马文坛人物扫描》，第 198 页，书辉出版社，1991 年 8 月。

萨克拉门托), 每日出版, 可说是海外第一份华文日报。^①

东南亚比较正规的华文报纸, 是新加坡华人薛有礼创办的《叻报》。1881年创刊, 1932年停刊, 前后维持达51年之久, 是新加坡一份历史悠久且有广泛影响的报纸。进入20世纪以后, 泰国、菲律宾、印尼、越南、柬埔寨等国, 均有多家华文报陆续创办, 此起彼伏, 从未间断。

华文报纸的创办, 为海外华文文学的产生提供了现实的基础和丰沃的土壤。编者为了提高读者阅读的兴趣, 常常在报纸上增设副刊, 刊登诗、词、散文、小说等, 这就是初期的海外华文文学。由于印刷条件、出版法例、读者人数等等的限制,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 海外华文文学作品都很少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 海外华文文学基本上是依附于报章副刊而存在, 单行本或是纯文学杂志都是寥寥可数的。

在五四文学革命以前, 海外各国的华文报纸都使用文言文, 副刊主要是刊登旧体诗词和文言小说。这一时期的海外华文文学, 仍属于旧文学的范畴。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 民主与科学的潮流席卷了整个中国, 在这股新潮流的冲击下面, 文学领域首先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以白话文写作而又贯串着反帝反封建内容的新文学作品, 迅速取代旧文学而占据了文学的主流地位。南洋得风气之先, 很快也出现了白话文学作品, 从而开创了海外华文新文学的历史。

海外华文报纸中, 最先出现白话文学作品的是新加坡。据新加坡文学史家方修的考证, 早在1919年12月, 新加坡的《新国民日报》副刊《新国民杂志》, 已开始刊登具有新思想、新精神的

^① 麦礼谦:《十九世纪美国华人报业发展小史》,见《华侨史研究论集》,第339~343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

白话文学作品。随后，马来亚各地的华文报纸也都相继刊登白话文学作品。1927年，吴碧岩在曼谷创办《国民日报》，辟有文艺副刊，主要发表本地的白话文学作品，可算是泰华新文学的发端。华文新文学作品在菲律宾的出现又更迟一些。大约1934年前后，菲律宾青年商人林健民办了二种文艺刊物，即《天马》（16开一本）和《海风》（只有16开一张），专门发表新诗和小说、散文，培养了不少青年作者，也为菲律宾新文艺运动的发展奠定了基础。^①美国的华文文学起步最晚，但发展很快，目前无论在质方面还是量方面，都有后来居上之势。早期到美国的中国移民，绝大多数是文盲，或文化水平不高，而且他们必须为生活挣扎奔波，因此，在早期的中国移民中，尽管也曾因不平则鸣而创作了许多俚谣民歌，但不可能产生作家。中国移民的第二、三、四代，由于有机会受教育，已出现了一些作家（例如曾跻身畅销书作者行列而风头颇劲的洪婷婷），但他们都是用英文写作，不在本书讨论的范围。五六十年代，台湾有大批青年学生涌到美国留学，形成一股热潮。在这些留学生中，有不少是在台湾时就已发表作品的作家，到美国后，那种独处异国的无边孤独，因文化、风俗歧异而产生的心理困扰，以及生活的艰辛，种族的歧视，无尽的乡愁，等等，更激发了他们的创作热情，促使他们拿起笔来，写下了许多被人们称为“留学生文学”的作品。以留学生文学为主体而发展起来的美国华文文学，到了七八十年代，早已越出留学生文学的范畴而在内容和题材上有了许多新的开拓，成为海外华文文学中一支令人瞩目的文学新军。

数十年来，海外华文文坛名家辈出，佳作纷呈，不仅形成了一支数量可观的海外华文作家队伍，而且产生了许多优秀的作品，

^① 施颖洲：《菲华文艺播种时期的回忆录》，载台湾《文讯》月刊，1986年第24期。

成为人类宝贵的文化财富。由于海外华文文学作品多数刊载于报章副刊，而较少有机会结集为单行本出版，因此，如纯粹以单行本来衡量，是无法概括海外华文文学的全貌的。方修先生仅就新马两地华文报副刊的作品数量作一粗略的估算，就发现其数量十分巨大。他写道：“战前新马二地，经常有 10 家华文大报同时存在”，“这些报章，都有其刊期频密或篇幅开阔的精彩的文艺副刊”，“每天半版或全版，绝少间断。现在，姑以每家报章的副刊平均每天推出 5000 字作品计算，则 10 家报章是 5 万字，一年就是 2000 万字”。^①如果把海外各国的华文报纸、杂志、单行本所刊载的文学作品合起来统计，这数十年的累积，其数量是非常惊人的。然而，令人感到遗憾的是，无数海外作家的心血结晶，长期以来，就像“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的梅花一样，只是默默地发散着清香，却很少受到世人的赏识，尤其是得不到华文的祖家——中国的重视。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对外开放，这种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变。越来越多的海外华文作品被介绍到中国来，并已成为学术界的研究对象，从而形成一门新的学科。因此，厘定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范围，给海外华文文学下一个科学的定义，已成了当务之急。

华文文学，顾名思义，凡是用华文（即汉语，海外华人多称华文）作为表达工具而创作的作品，都可称为华文文学。华文文学也像英语文学、法语文学、西班牙语文学一样，是世界性的，因此，华文文学和中国文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中国文学包括中国大陆的文学，以及同属中国文学，但由于社会形态不同，因而具有不同特色的台湾文学、香港文学和澳门文学。华文文学的范围

^① 方修：《新大所藏旧报章的文学史料价值》，见《新马文学史论集》，第 323 页，三联书店香港分店、新加坡文学书屋，1986 年。

则要广泛得多，除了中国文学之外，还包括海外各国，例如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越南、柬埔寨、日本、朝鲜、毛里求斯、澳大利亚、英国、法国、美国、加拿大等国家出版的华文文学作品。华文文学和华人文学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海外华人用华文以外的文字（例如英文、法文、西班牙文、马来文、泰文等）创作的作品，称为华人文学，而不能称为华文文学。相反，非华裔外国人用华文写的作品，却可以称为华文文学，例如澳大利亚人白杰明用华文写了很多杂文，还出过两本集子，都可以归入海外华文文学的范畴。

根据以上所述，我们可以大体上给海外华文文学下一个定义，即：在中国以外的国家或地区，凡是用华文作为表达工具而创作的文学作品，都称为海外华文文学。

在定义确定之后，对划分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范围，会带来许多方便。不过，由于许多作家的定居地点经常出现变动的情况，有时仍会出现一些困难。例如，陈若曦出生于台湾，青年时代到美国留学，以后回祖国大陆工作，1973年到香港、加拿大，取得加拿大国籍，目前则定居在美国。她在台湾已开始发表作品，但她的成名作《尹县长》等小说，却是以“文革”为题材在香港发表的，因此，把她划为哪一个地方的作家，都有一定的道理。考虑到她目前已长期定居在美国，她的主要作品也是在到美国后发表的，我们认为还是称她为海外华文作家为宜。在学者的一些论著中，常常把於梨华、聂华苓、白先勇、欧阳子、张系国、陈若曦、非马、许达然等人称为“台湾作家”，这是不妥当的。这些作家虽然出生（或成长）于台湾，在台湾求学，在台湾开始走上文学道路，以后又经常在台湾发表作品，但也要看到，他们在美国已居留二三十年之久，许多人并已取得美国国籍；他们已融入美国社会，接受了美国文化和价值观念的潜移默化，因而他们观察

问题的立足点，他们面临的困境、难题，都与台湾作家有很大的不同；他们作品的题材、主题、人物、写作手法，以及他们的作品所表现的文化意识、心理素质、审美情趣等，也与台湾文学有很大的差异。因此，再把他们称为“台湾作家”，是十分勉强的。毫无疑问，他们的作品应属于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范围。

海外华文文学是在中国文学的母体中孕育诞生的，而且，绝大多数海外华文作家都是炎黄子孙，自幼受到中国文学的熏陶，因此，海外华文文学必然与中国文学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中国文学，尤其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然而，“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数十年来，海外华文文学在异国的土地上发育成长，由于不同的社会背景，不同的生活环境所提供的不同的文学土壤，由于各居住国人民的风俗习惯、历史文化的陶冶，以及西方文化的影响，这就使得海外华文文学既具有与中国文学一脉相承的血缘关系，又呈现了与中国文学迥然不同的多姿多彩的独特风貌。这一点，可以说是海外华文文学的最主要的特点，也是最基本的特点。

海外华文文学是在贫瘠的土壤上开放的野花。由于作家人数不多，读者范围狭窄，发表园地有限，以及印刷出版条件的制约，当地政府的歧视限制等，注定了海外华文文学的先天不足。这种先天不足也造成了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关系只能是单向的，而不是双向的。也就是说，中国文学对海外华文文学的影响是巨大的，而海外华文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却微乎其微。

中国现代文学对海外华文文学的影响，大体上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国文艺思潮对海外华文文学运动所起的推动作用；二是中国现代著名作家对海外华文创作所起的引导作用。

上面谈到，海外华文新文学，就是在五四文学革命的影响下诞生的。五四以后，中国的历次文学运动，例如革命文学运动，文

艺大众化运动，两个口号论争，抗战文学运动等，都对南洋文学运动产生巨大的影响。尤其是抗战文学运动，在东南亚各国掀起了抗日高潮，在历史上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

我们在阅读海外华文作品的时候，常常能够在风格、手法、句式等方面看到一些中国现代著名作家的影响的痕迹。例如，新马的一些杂文，特别是论战性文字的那种冷峭、尖刻的词锋，可以明显领略到鲁迅杂文的风格。姚紫小说中的一些女性形象，读者也可以感受到茅盾笔下女性的熟悉面影。泰华作家陈汀的长篇小说《三聘姑娘》，无论是小说的布局、人物或是主题思想，都与巴金的《家》极其相似，这一点连作者也不讳言。至于艾青对东南亚写实派诗人影响，更是历久不衰。

对海外华文创作有过影响的作家，当然不只这些，我们还可以开出一长串的名字，例如郭沫若、郁达夫、老舍、曹禺、臧克家、胡愈之、田间等等。开出这些名单，是为了说明，海外华文文学在其婴幼儿阶段，是怎样喝着中国文学的奶水长大的。即使在长大成人之后，在其躯体中仍然留存着中国文学的遗传基因，显示出与中国文学一脉相承的特质。

随着海外华人政治地位和思想观念的变化，海外华文文学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呈现出阶段性。如果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分界线，可以看出战前和战后具有明显不同的特点，与中国文学的关系也有不同的表现。战前，旅居海外的中国人，大多数还是华侨的身份。他们与祖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因此，海外华文文学也一直受着中国文学的巨大影响，实际上可以称为中国文学的支流。战后，各种社会政治条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绝大多数华侨已加入了侨居国国籍。这种状况反映到文学上，就是作品中本地色彩的增强，并且逐步脱离了中国文学的轨道，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

海外华文文学作品中本地色彩的增强，以新马表现得最为突出。早在 1927 年，新加坡《新国民日报》副刊《荒岛》的编者，就已提出要“把南洋的色彩放入文艺里去”。^① 1929 年，曾圣提又发出了“以血与汗铸造南洋文艺的铁塔”的呼吁。^② 在他们的提倡下面，出现了一些以南洋生活为题材，描写南洋风物的作品，但尚未形成一股潮流。1947 年，在新马两地，爆发了一场“马华文艺独特性”与“侨民文艺”的大规模论争，本土意识更为增强。尤其是 1956 年提出“爱国主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之后，马华文学终于走上了自己的道路。

战后的东南亚华文文学，一改过去只关心中国，服务于中国的政治斗争的宗旨，而变成关心自己的命运，关心居住国的民族民主运动，热情地投身于新国家的建设中。在这种思想观念的转变中，最典型的莫过于文学中“祖国”含义的改变。战前的华文文学，“祖国”指的是中国；战后，尤其是 50 年代以后，“祖国”指的是华人生于斯、长于斯的国土。这种祖国观念的改变，对于土生华人来说，没有丝毫的心理与感情的困扰。他们热情地讴歌自己生身的乡土，与新的国家认同。而对于从中国南渡的华人来说，这个新的祖国对他们是既亲切而又疏离，既熟悉但又陌生，无论在心理上或感情上，都有一个困难的适应过程。随着思想观念的转变，海外华文文学，尤其是新马华文文学在战后迈上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无论是题材、人物、主题或是表现手法，都表现了与中国文学不同的特异风采，使海外华文文学以一种崭新的面貌进入世界文学之林。

^① 张金燕：《漫浪南洋一年的〈荒岛〉》，见方修编的《马华新文学大系》第 10 卷，第 100 页。

^② 曾圣提：《〈文艺周刊〉的志愿》，见方修编的《马华新文学大系》第 10 卷，第 112 页。